

史

家



仓修良 / 著

史

籍



SHI JIA
SHI JI
SHI XUE

山东教育出版社

史

学

K092-53
C092

史家籍学



仓修良 / 著

SHIJIA SHIJI SHIXUE



0074282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家·史籍·史学/仓修良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328-2942-1

I. 史… II. 仓… III. 史学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078 号

史家·史籍·史学

仓修良 著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2023919 传真: (0531)2050104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31.625 印张
插 页: 5 插页
字 数: 7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2942-1/K · 73
定 价: 43.90 元

(如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我从事史学史的研究已经整整 40 年了。40 年来，我一直坚持在这块园地里耕耘，一切研究都在这块园地范围之内。方志学和谱学都是史学发展中所产生的分支，都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位史学界老前辈在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论著中就曾说过，谱学和地记（方志初期阶段），都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两种史学方式，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肩负的任务都是一致的，都是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它们也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研究的对象。正因为我研究的都是关于历史学家（或方志学家）、史学著作和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于是，奉献给读者们的书名便题为《史家·史籍·史学》。

我对章学诚的研究亦几乎持续了 40 年之久。从研究史学史以后，就一直以他为主轴而向外辐射，因为他不仅是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而且又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对文学、哲学、校讎学、谱学等方面亦多有建树，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他的史学理论与刘知几齐名，按白寿彝先生所说，他的史学理论比刘知几还要高一个层次。但是他的一生非常坎坷，面死后又一直被人所冷落，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他的一生“不作违心之论”，“生平为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41 岁方才考取进士，9 年后的冬天，“已垂得知县”，可是为了自己所爱好的文史校讎之业，又决计舍去。若从生活考虑，一个知县养家活口自不成问题，然而一旦做了县官，自己所好之文史校讎将如何

处置？经过比较，最后还是弃了县官之位，以继续自己的文史校讎之业。仅此两点，今天能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由于他所从事的是文史校讎之业，因而就养成了其“好辩”的习惯，当然也就得罪了许多人，以致死后也得不到公正的评论，直至新中国建立后，也未得到改变。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在其所著《章学诚的一生与思想》一书中对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指名道姓所作的批评：“他们有的只是认识到章学诚学术的一部分，有的甚至误解。章氏一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对大多数人而言，章氏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思想家。”这个批评，自然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对于章学诚我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有多篇是为其辩白。有人说由于章学诚在考据上斗不过戴震，所以就拼命贬低戴震，为此我写了《章实斋评戴东原》，指出章学诚对戴震是褒大于贬，那种贬低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况且，在当时真正认识戴震学术价值之所在的正是章学诚；有许多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产生误解，我则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明章学诚当时论述“六经皆史”说的社会意义；有人说章学诚不是浙东学派（史学）的成员，我便写了《章学诚和浙东史学》，指出章学诚是名副其实的浙东史学殿军；有的学者认为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已经包含在刘知几的“史识”之中，我又写了《“史德”、“史识”辨》一文，指出“德”与“识”属于不同概念，“德”是指行为规范，道德品质，“识”则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众所周知，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提出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言壮语，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就不再看到有历史学家提出“成一家之言”的要求。我从章氏两篇佚文中发现，他竟也曾提出要“成一家之言”的目的，由于佚文长期未被学者们看到，所以我又写了《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指出他要成一家之言的途径与司马迁全然不同，

他要通过自己的文史校讎而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很高兴地告诉读者，他这个目的是完全实现了。

曾有朋友这样对我说，由于我长期对章学诚的著作进行研究，因而章氏治学精神中的某些特点也影响了我，如“善于辩”。这自然是客气的说法，说白了不就是“好辩”吗？记得十多年前有个刊物的编辑同志正是冲着我这“善于辩”而要我给他一篇稿子。我认为，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好辩”未必是件坏事，对学术界的历史悬案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对学术界争论而有意见分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研究的结论不同意而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等等，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有什么不好呢？大家都不是承认真理是越辩越明吗？做学问本来就是要能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否则老是去作无病呻吟的文章到底有何价值？我十分坦诚地承认，我在做学问过程中每遇问题确实“好辩”，一定要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不仅是表现在对章学诚的研究方面，而且是表现在我做学问的全过程，只要遇上问题，总想参与争论。因为我相信，只要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通过学术争论和讨论，可以达到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展的目的。如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成的“学案体”，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学家所创立的最后一一种史书体裁，但自诞生以后，一直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海外有些学者却先后发表不少文章，但是，他们着眼点偏重于从学术思想史内容去找源流，因而把《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淮南子·鸿烈篇》等一一罗列，很少考虑这种“学案体”的结构组成，不是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进行研究。而美国一位学者仅从“学案”这个名词来探源，因而把明万历年间刘元卿所作《诸儒学案》看作是“学案体”的首创。为此，我先后写了《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黄宗羲与学案体》、《历史学家黄宗羲》等文，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是属学术史，但是，所有学术史著作未必都是“学案体”，

因为作为一种史书体裁的“学案体”是由几个特定成分组成的，正像纪传体史书一样，单独的人物传，谁也不会承认它是纪传体。而在分类上那种把学案体附在传记一类的做法也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史体与人物传记决不相同。

对于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我原拟撰写一系列文章，后发现许多学者都在作专门研究，从而放弃了此打算。因为我研究问题还有个习惯，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多研究一些被人所冷落的史家和史著。但是对于司马光和《通鉴》，我还是发表了一组和别人商榷的文章。在庆祝建国 30 周年时，我校举行了大型学术讨论会，还邀请了京沪等地学者前来参加。当时我写了一篇《〈资治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副标题是《兼谈〈资治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关于《通鉴》编修分工，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因翦老（伯赞）一篇文章引起过争论。对这个历史悬案，我也想谈点看法。不料前来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一位北京来的学者，在看了拙稿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某刊物发表一篇文章，以讥讽挖苦的口气对拙稿进行批评。学术讨论和批评，应当本着与人为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和道德规范，即使别人错了也不能讥讽挖苦，何况我并没有错。本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我自然要写一篇答辩文章，我发现这位先生的错误在于对司马光给刘恕的那封信理解有误，我想还是一道来读一下这封信吧，于是便写了《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文章本着心平气和的说理，而不是你来一枪，我必回敬一刀。我认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必须平等相待，以理服人，决不允许盛气凌人，只要双方把司马光这封信都理解正确了，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后来我又写了一篇《〈资治通鉴〉编修分工及优良的编纂方法》，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在《通鉴》编修过程中，刘恕、刘攽及范祖禹三人分工及主编司马光本人所做的工作。司马光是封建时代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但是也曾有位先生写了文章批评司马光

在其著作《资治通鉴》中有曲笔现象，我拜读后深感并非事实，于是就写了《从〈通鉴考异〉看司马光的求实精神》，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司马光编修《通鉴》，凡所征引的材料，大多经过考证，往往一事而用三四种史料纂成。他曾作《通鉴考异》30卷，目的就是为了把史实的取舍经过全部告诉大家，他所编写的史书，都是有根有据，若有疑问，有《考异》备查。这就说明他作史光明磊落，不怕别人挑剔，这种做法还是前无古人的。针对有的著作说司马光是位宿命论者，我也持不同看法，因而又写了《司马光无神论思想剖析》一文。可见我对司马光所写文章，大都出于对有争议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针对方志学界有些人把《越绝书》说成是地方志，我曾写了《〈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从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等多方面论述了《越绝书》只是一部地方史，而绝不是地方志。文章发表后，新华社还发了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里作了广播，《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多家报纸分别以不同的标题加以转载。文章附带讲了该书应成书于战国后期，其作者自然就不是袁康、吴平了。其实此说宋人陈振孙和近人余嘉锡都早已提出，可惜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后来为了替周生春先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一书作序，不得不再与《越绝书》打交道，因为两书内容有其互补性，历史发展使它们似乎如同姊妹篇了。在研究过程中，尤其看到《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不仅正史《后汉书》有传，地记《会稽典录》中也有记载，而且将他与王充相提并论，视为当时会稽学界的代表人物，而历代谈论或记载《吴越春秋》时，也必然提到赵晔，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再按此道理来查被杨慎誉为“百年一贤”的袁康、吴平，自东汉至明中叶前，竟然蛛丝马迹全无，于是使我感到这两人全然不像历史人物，实际上乃子虚乌有。于是便写了《袁康、吴平是历史人

物吗?》，副标题是《论〈越绝书〉的作者》。指出历史上并无袁康、吴平其人，乃是明代中叶学者杨慎所臆造的人物，既然是假的，就不应该让其继续蒙骗我们子孙后代了。鉴于浙江方志学界至今还有人大力宣扬《越绝书》是最早的地方志，当然，我不得不再作辩论，特写《〈越绝书〉散论》一文，对该书性质、作者、归属、内容、书名等一并加以论述。文中指出，学术研究，存在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当别人已经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时，理所当然的应当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真的错了就不必惋惜而放弃，若是觉得没有错，则应当勇敢地进行辩论，千万不要做失理也不饶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物。笔者那篇文章发表已经8年，从未见到有辩论文章，然而坚持认为《越绝书》是浙江最早的地方志文章却从未间断，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文章对袁康、吴平不是历史人物又作了进一步论述，同时指出炮制这两个臆造人物的杨慎，竟是一位“造假老手”，所作伪书甚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有揭露。文中特别对归属问题作了论述，因为向来被看作浙江最早之史籍或方志，从未有人提出过疑义，可见习惯势力影响之深远。书中明明讲了，这是吴、越两国贤者所作，所记内容又分明是为吴、越两国之事，并且几乎各占其半，以今天而言，显然应当是江、浙两省所共有，并非浙江独有。在科学研讨上，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客气好讲。多年来一笔糊涂账，应当讲讲清楚。

我国历史悠久，产生过许多有作为，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但是，长期以来，研究总是集中在一些大家身上，而有很大一批史学家一直被冷落，有的至今尚鲜为人知。为此，我早就有过想法，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史家逐个加以研究，让他们的事迹和贡献，也能够得到发扬，而不至于长期被埋没下去。如应劭的《风俗通义》，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术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见

解，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常璩的《华阳国志》，保存了方志早期阶段地记的许多著作形式，因此，它成为研究地记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多得的著作；颜师古一生为《汉书》作注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班固之功臣；郑樵以一个人的力量编著《通志》，但长期以来却一直得不到公平的评论，直到清代章学诚才出来为之讲公道话；洪迈的《容斋随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笔记，许多史学观点都很有见地，因毛泽东同志晚年读了此书，所以一段时间里一度成为热门书；胡三省是一位爱国史家，他以一生精力为名著《资治通鉴》作了详注，为后人研究《通鉴》提供了方便；明代王世贞，长期以来一直以文学家著称，其实他还是一位有很大贡献的历史学大家；与王世贞同时的胡应麟，是位杰出的辨伪学家，他撰述了我国首部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是我国辨伪学的奠基人；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以一个人的力量编著了长达 400 万言的明代编年史，一稿被盗后，已经年过半百，强忍悲愤继续再写，其精神实在感人至深；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清初称为海内三大奇书之一；全祖望曾替黄宗羲完成《宋元学案》这部“学案体”宋元学术史，并使这种学案体得到完善；万斯同、邵晋涵都是“浙东学派”重要成员，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是读史入门之作，如此等等，都吸引着我花了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可与读者共同享受此中之乐趣。

方志学是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因而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因为方志既然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那么要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把它放到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找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可是，许多研究方志起源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仅就某部书坐而论道，大谈方志起源，因而起源《周官》说，起源《禹贡》说，起源《山海经》说等等，甚至

直到现在，这些说法从未中断。为此，我早在 80 年代就先后发表了《论方志的起源》和《再论方志的起源》等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讲过，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反映论。我正是用这种观点，建立起自己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上的思想体系。研究方志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观点，我照此办理，很快摸清了方志的起源和发展规律。大量史籍记载说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都称之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就表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所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既然如此，我国郡县制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而在郡县制度未确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否则将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这种著作，西周当然就更不必说了。根据我国秦汉以来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方志是起源于两汉地记。况且史书对此也早有确切的记载，令人不解的是，许多人也都知道这些材料，就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贊。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这段文字说明，地记这类著作，还是由统治者所提倡而开始的，光武帝刘秀，为了宣扬自己的家乡，诏撰了《南阳风俗传》，这么一来，各地纷纷仿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总结性地指出：“郡国之书，由是而作。”这就是说，地方性的郡县著作，从这个时候便开始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地方志初级形式，这种地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盛行。可是到了隋

唐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图经遂取代了地记而行使其历史使命，方志发展便进入了第二阶段。直到宋代，方志才逐渐定型，成为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志，这就是方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可见方志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及发展规律的，特别是三个阶段皆有自己不同特点。至于为什么在发展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事实上方志既然是独立的一门学科，自然也就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要离开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而去研究特点和规律是不可能的。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可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固然有其明显的区别，即使是成型后的方志，亦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代烙印。正像我们今天所编修的新方志一样，它必然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不仅要体现在观点上，而且要反映在内容、体例等各个方面。以上所述，尽管我在拙著《方志学通论》中都有详细论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能够看到此书的人并不多，所以特别撰写了《方志学概述》一文。由于方志学是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当然，对于方志学界的情况我不仅要了解，而且也参与许多修志活动，特别是新编志稿评议会、新修方志首发式等，从 80 年代开始修志以来，从未终断过，从中我汲取了不少新的养料，加之看了许多已出版的新修方志，也发现不少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以便及时修正。如许多新修方志过分强调了经济部类，而削弱了其他内容；1992 年 5 月我查阅过的 229 部新修方志中有半数以上的方志将“艺文志”砍掉了；民国时期的内容不仅很少，而且有的还把民国时期的政府机构放到附录中去了；许多新方志序很多，成了排位子、拉关系的装饰品，三序四序不足为奇，有的竟达七八序之多；方志本是资料性著作，有的则大谈宏观，大讲规律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与方志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误导有着密切关系，不仅如此，而且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有人说修志中“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功能已经

过时了；“据事直书”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有的还编造出“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特点”等等。还有不少著作将历来公认的舆地著作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等也都列入方志行列，诸如此类，甚是不少。为此，我先后写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如何写好新修方志人物传》、《新修方志中艺文志不可少》、《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等文。写这类评论文章，要批驳错误的观点，势必牵涉到人，甚至可能得罪一大片。但考虑到事关新一代方志编修的质量，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连这点胆量和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做学问呢？相信广大修志工作者和方志界同行也定会理解的。

谱牒文献同样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研究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与文化提供许多无可替代的重要史料。可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这门学问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谱牒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家谱，毫无疑问属于封建糟粕，几乎无人敢于问津。然而在海外，如美国、日本的许多汉学家，却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谱牒，台湾不少学者也一直在研究，还两年举行一次族谱研讨会。80年代以来，大陆有些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陆续发表一些论文，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我在阅读海内外学者一些论著时，却发现了不少问题很值得商榷。如有的把谱学直接说成是家谱学，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有的离开时代条件来谈谱学的产生；有的把西周铜器铭文上的世系表说成是私家之谱，把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叙》和班固《汉书》中的《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有的相信并宣扬某些家谱中将传说中人物作为自己的始祖；更有许多文章将某些家谱中伪造的历史，不作任何考证，就把它作为可靠的信史而大加宣扬，并且鼓吹是新发现等等。为了澄清什么是谱学及其产生、发展诸问题，特写了《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论谱学研究中的随意性》等

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又都带有辩驳性质。写到这里，深深感到学术评论之不易，文学、史学如此，方志学、谱牒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此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能从事于学术评论工作，使史学史、方志学和谱牒学研究的理论水平都能大大得到提高。

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有两点体会，第一，做学问从来不赶风头，因为风向是常在变的，永远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切忌随波逐流，要能做到“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①。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做学问必须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千万不可见风使舵，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把自己研究的问题深入下去。第二，从不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这里不妨再引章学诚话来说明，他告诉大家，“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②。这就是说，要想在学术上做出成就，没有这种“善弃”的精神是很难想像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分主次地样样都研究，结果将是样样都研究不好。所以必须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珍惜光阴，刻苦奋斗。有的青年朋友问我，既要研究史学史、文献学，又要研究方志学、谱牒学，精力是否分散？我回答说，看起来确实是好几门学科，但他们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况且都是同出一源，方志学、谱牒学本来就是史学的两个

^① 《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② 《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发集》。

分支，研究起来往往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因为都无需另立门户去研究。对于应酬之类文章，我也并非一概拒绝，而是往往借应酬文章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若与研究范围无关，又不能借题发挥，则一律不写，可以说毫无客气余地，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研究正常进行。

我与山东教育出版社交往已经有 18 年之久，称得上是老朋友了。他们已经出版许多影响很大的学术著作，因而他们已是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全国优秀出版社之一。我已先后在此出版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史记辞典》和《汉书辞典》等。承该社领导的厚爱，又为我出版这部著作；责任编辑温玉川编审，在编辑出版此书中付出了辛勤劳动，对于他们的深情厚意，我由衷地表示感谢和敬意！

最后，热忱地希望史学界、方志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对本书批评指正！

1999 年 6 月 7 日序于浙江大学寓所



作者简介

色々良 1933年3月出生于江苏泗阳。1958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本科。一直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98年国务院决定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四校合并后，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社会兼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中国谱牒学会理事、浙江方志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宁波大学兼职教授、温州师范学院兼职教授等。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两种）、古籍整理：《爝火录》（合作）、《文史通义新编》；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史记辞典》、《汉书辞典》等。另发表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历史文献学诸方面论文近二百篇。

目 录

自序

试论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	(1)
《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	(25)
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	
——论《越绝书》的作者	(32)
《越绝书》散论	(41)
从《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看《吴越春秋》的版本、体裁、 内容和价值	(57)
应劭和《风俗通义》	(74)
常璩和《华阳国志》	(95)
颜师古及其学术贡献	(114)
唐前五代史和五代史志	(132)
“史德”、“史识”辨	(139)
《资治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	
——兼谈《资治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	(144)
刘攽——笔下能当万人敌	(159)
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	
——再谈刘恕参加《资治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164)
《资治通鉴》编修分工及优良的编纂方法	(172)
从《通鉴考异》看司马光的求实精神	(189)
司马光无神论思想剖析	(218)
郑樵和《通志》	(231)